

苔

周恺 著

中信出版集团

苔

周恺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苔 / 周恺著.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9.5

ISBN 978-7-5086-9192-3

I. ①苔…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 147235 号

苔

著 者 : 周恺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mm × 1240mm 1/32

印 张 : 16.375 字 数 : 384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 ISBN 978-7-5086-9192-3

定 价 : 6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 author@citicpub.com

方言之魅，职人之作

欧宁

首先要感谢楚尘 2006 年邀请我为王笛的著作《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设计封面，阅读此书开启了我对四川地方历史和地方文化的兴趣。2010 年访问美国时，我认识了当时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读博士后的马钊，他和王笛曾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威廉（William T. Rowe）的研究生，同属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的《新史学》学刊的同仁圈子。马钊又介绍我认识了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东亚系主任司昆仑（Kristin Stapleton），后者是《成都的文明化：中国城市改良，1895—1937》一书的作者，正是她为我打开了进入李劫人的文学世界的大门。如果没有对李劫人小说的热爱，我就不会在 2012 年编辑《天南》文学双月刊的“方言之魅”专题时，被一篇遭到其他刊物拒绝的自由来稿紧紧抓住眼球，当时作者周恺年仅 22 岁，来自四川乐山。

这篇题为《阴阳人甲乙卷》的短篇小说，写了民国时代乐山乡下一个年轻女子因为偷谈恋爱，闹出人命，后来寄人篱下，被死者之父鹊巢鸠占，最后身体性征变异，成为阴阳人的故事。这

样的故事读来好似乡野奇谈，但作者却身姿端正，站在“逝者如斯夫”的时间之岸，试图以史家的目光，写出乱世中芸芸众生的“裸命”（bare life）状态和他们混乱交缠的情欲——“世事东去，万古江流，大渡河自上古开山，便奔着大海而去，流经郭落坝，不曾驻足，生民却在此耕作繁衍，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在生动饱满的细节铺陈之下，他的叙事如幻似真，令人惊悚。其中那些仿如密码般需要破译的乐山方言、袍哥暗语、江湖歌谣、四川乡土生活的繁复仪轨，以及人神共处的诡异氛围，令我相信李劫人那被人遗忘的衣钵，已经传承到这个年轻人手里。

我毫不犹豫地决定在《天南》上刊用这篇小说，它成了周恺首次公开发表的处女作。它非常有力地支持了那期“方言之魅”的专题，同期发表的其他作品还有用上海话、广府白话、客家话、海丰话、闽南话、绍兴话、北京话、榆林话、张掖话、沈阳话和曲阜话写的。在這一期的推荐语里，我写道：“方言对应着地方，对应着全球化力有不逮的边缘。回顾中文写作史，五四时代用白话文挑战文言文，新中国建立后用革命话语埋葬民国风雅，今天派用朦胧诗为汉语去意识形态化，作家们好像都遗忘了方言这一利器。它的自闭性所蕴含的力量也许要通过转译来打开，但谁又否定得了今日翻译文学的必要性呢。”及至2013年金宇澄的《繁花》出版，我才发现，不论是年轻的还是稍为年长的中国作家，他们用方言的魅惑去消解统一语言的单调的写作努力，已潜行多时，并集腋成裘。《繁花》是近年来本人在有限的阅读中最爱的长篇小说，不仅因它是用沪语写成，更因它活化了中国古典小说中的话本传统。

《天南》在第九期首发了周恺的《阴阳人甲乙卷》之后，又

分别在第十期、第十二期发了他相似风格的《如她》和《牛象坤》，并在第十三期发了《阴阳人甲乙卷》的英文版。之后不久，他就开始了首部长篇《盲无正》的写作，《天南》在第十五期和第十六期分别发了它的第一章（同时配发英文版）和第二章。这是一部超现实寓言，没有特定的时代和地方背景，故事发生在盲村，一个子虚乌有的蛮荒村庄，村民祖辈是盲人，经过演化的后代才能看见光明，他们陷入了周期性的没有太阳的黑暗困境，以各种离奇神秘的方法进行挣扎应对。这个故事褪去了所有文化的附着物，几乎是对原始初民的生存状态的还原。在这个意义上，我把它看成一部哲学小说，他的风格在这里开始出现了分叉。到他完成这部长篇的时候，《天南》已经停刊了。他不仅高产，而且尝试多种写法，我的阅读已追不上他的创作。

之所以这么大费笔墨地去回顾我遭逢周恺的曲折路径，是因为这一来路现在又折返回它的起点：《苔》将由楚尘出版，而且是一部回归《阴阳人甲乙卷》风格的作品，或者说是从他的起点再出发，在更大的框架和更广的空间下深耕的作品。这是一部30万字的“巨构”，时间跨度从光绪九年（1883）到辛亥革命（1911），与李劫人的“大河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几乎相同。《阴阳人甲乙卷》并不明说年代地点，读者只能根据小说中出现的“冯玉祥”“铁牛门”等字眼来推断它的时空，而《苔》的故事发生地则明确锁定为嘉定（乐山旧称），周恺显然下定决心来写一部他家乡的断代史。隔着这么久远的距离却又要写出“临场感”，这正是小说要迎接的挑战。它与历史研究之类的非虚构写作不同，不仅要求作者收集和研究原始素材的能力，更考验作者的想象力和重新组织叙事的能力。不像很多从个人经历出发的年

轻作者，周恺一开始就偏向用第三人称讲述“他人”的故事，他没有被自己的肉身体验所限，而是依靠阅读和考证去拓展自己的眼界，到方志、族牒、传奇、掌故、旧闻中去开挖他的文学矿藏。我读到的《苔》，正是他的写作工坊初创“品牌”的“扩大再生产”。

这部长篇从一个回乡重整家业的地方缙绅李普福寻找新生儿承续家族香火写起，以桑农刘基业的两个儿子的不同命运为两条线索（李世景被抱入李家成为土豪继承人，最后资助革命党；刘太清则留在底层成为石匠，最后变成绿林山匪），中间穿插了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新学的兴起、科举的终结、保路运动等历史事件，把大清政权的危机、反对派的滋长、秘密会社的活跃、地方秩序的迭代、大家族没落的故事，渐次编织在周恺的家乡地理的经纬网络上，把嘉定这个地方的二十多年的嬗变浓缩于一册书写。相对于王笛和司昆伦那些以真实和科学为准绳、聚焦于四川特定时期的微观史学著作，这样的文学书写能把读者更深入地带到更逼真的历史现场。随着叙事线索的展开和文学细节的放大，读者仿佛身临其境，目睹眼前发生的一切。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史学的代表人物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和孔飞力（Philip A. Kuhn）等时常也要收纳文学作品这种非信史材料，甚至汲取文学叙事的写法。周恺在这部小说中对哥老会和民间手工业行会的规条和切口、地方团练的层级和组织方式、农业生产和商业流通的各个环节、妓寨和烟馆的空间场景、蜀地民俗的细枝末节、清末学制和课程的设置等等的细致还原，已经达至学术研究和田野调查的精确要求。他在这方面下的苦功夫，夯实了他的虚构写作的历史背景，为故事的叙述铺设了清晰可见的时代底色。而对那个时代的乐山方言的进一步淬炼，更是加强了这部小说的“地方感”

(sense of place)。

《苔》对李劫人的“大河三部曲”的师承痕迹是非常明显的，但让周恺区别于李劫人的，正是他们各自写了不同的“地方”：李劫人写的是成都地区，周恺写的是乐山地区，尽管共享了四川一省的历史和文化资源，但它们分属两人文学世界不同的“原乡”。每个“地方”，大至一国、一省、一城，细至一个街区、一个村庄，都有各自的DNA，它们之间的差别可以非常细微。通常辨识一个“地方”的依据是“地方知识”，古希腊称之为“米提斯”(metis)，它是指一个地方独有的无法被转译为通识的经验。例如方言、地方性的度量衡、未经规划自发形成的社区地理、历史记忆、邻里关系、身份认同、食物偏好、传统手工艺、以身体进行记忆的秘诀等等，它是匿名的，没有个人著作权的，它会根据日常生活的需要不断进行调适，但始终根植于一方水土，帮助形成地方风俗和地方性格。对这种地方知识的获得，来源于生于斯长于斯的生命经历以及后天继发的研究，它对人的长期濡化，进而会使人形成对家乡的“恋地情结”(topophilia)，这个词由英国诗人约翰·贝杰曼(John Betjeman)首创，后来被美籍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普及，用来指称人与地方或环境的情感纽带。正是这种指向不同的“恋地情结”，形成了李劫人和周恺文学世界的差异。

《苔》可以称得上是乐山“地方知识”的集大成者，而周恺对乐山的“恋地情结”，则在当下中国的文学生态中发育生成了一个闭合自足的地景系统。如同《繁花》一样，它是对全球化无差别文学生产线的抵抗。从全世界的范围看来，中国当代文学是众多语种写作中的一个小的系统，而地方性题材的方言写作又是更小的系统。从国族差别的角度来说，不管是中国哪个地方的方言写

作，都要从他们共享的中文传统文学资源中寻找养分，这样就可以形成与其他国家或语种不同的“中国性”，而不同国家或语种的流通，则要交给翻译来完成。从《苔》和《繁花》往前追溯，可以看见的是一条从李劫人的“大河三部曲”到曾朴的《孽海花》，到曹雪芹的《红楼梦》，再到明清话本的清晰的营养链，不同时期的文学风景扎根于不同的地理和历史，但它们血脉相通，共处于多元化的世界文学的同一生态位。诚然，地方性的写作会提高交流成本，一部 30 万字的中文小说可能不符合英语出版市场适当可控的字数标准，但作家不以市场为导向的写作以及他们作品中的地方印记，才是真正有机世界文学图景的构成要素，它们是从不同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千差万别的植物，而非工业流水线上的标准产品。

阅读《苔》如同欣赏一件职人手作，它以经年累月的劳动打磨而成，你不知道它的窍门在哪儿，但光滑的语感和复杂的故事肌理让你惊奇不已。又如同在市井街头茶馆听人摆龙门阵，只见七嘴八舌，人声鼎沸，但说法千头万绪，真假莫辨。它涉及的人物五花八门，都是动荡时代里如苔草般附土求存的生命，在方言和地方环境的包裹下，个个都带有川人的性格因子：从精明的富商李普福，到狡黠的蚁民刘基业；从懵懂成长的李世景，到沦为匪寇的刘太清；从道貌岸然的书院山长袁东山，到激进勇猛的革命党人税相臣；还有数不清的次要人物和众多的女性角色，但小说没有女主角，唯一着墨较多的是李普福的幺姨太，因与刘基业私通而被溺毙。如同徐皓峰的一部民国小说《大日坛城》一样，《苔》写的也基本上是一个以男性为主的世界，里面的女性人物在故事主线中没占多少篇幅，或者写到了，但人物欠缺主体性，这恐怕也要和徐皓峰一样遭到女性主义读者的诟病。幺姨太虽然敢

于越轨，但并不像李劫人《死水微澜》里的邓幺姑那么火爆激烈。李劫人写邓幺姑，是自然主义的写法，并不是对流行的妇女解放观念的图解。读者大可不必执着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妇女解放的政治正确，也不必用今天的性别理论去要求一个虚构的历史故事。自然主义是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产生的文学流派，主张超级真实，作家要隐藏自我，力求客观，按事物的本来面目来写作，不强加观点，不塑造典型人物，不追求戏剧性。这个在二十世纪已不是什么新手法，它甚至被引申为超级写实主义（Hyperrealism）绘画和雕塑，以及真实电影（Cinéma Vérité）的基本原则。

《苔》继承了李劫人的自然主义笔法，孜孜以求一个地方历史的真实。为了保持客观冷静，它甚至去掉了《阴阳人甲乙卷》中那种带有历史书写者口吻的评论和感慨。乐山和四川的读者应该感谢周恺，他为自己的家乡写作了一部充满地方风情和民间野趣的大传。《天南》曾经的作者阿乙和任晓雯最近出版的《早上九点叫醒我》和《好人宋没用》也是展开地方书写的长篇作品，前者聚焦江西瑞昌，后者聚焦上海，都是他们各自的出生地。这令我想起小时阅读的黄谷柳的《虾球传》，尽管带着我那时尚不能辨识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它对珠江三角洲泛粤语地区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却令我备感亲切。我们的生命被造物主投放在一个不能自择的地理上的小点，随着我们的成长，这个陌生的空间慢慢变得熟悉，慢慢变成承载记忆的一个地方，当我们离乡远行，它变成了我们不断思念的原乡。在全球化无远弗届、人与事激烈变迁的时代，我们需要这样的文学作品，来保存我们的地方知识，激活我们的地方记忆。

在认识周恺后，我特地到乐山去拜访他，去认识他笔下故事

的发生地。这个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汇流的地方，水文未变，乡音无改，但人口数量和城市空间已经倍增，街道格局和建筑风貌已经难觅过去的影踪，幸好它周边的乡镇仍然保留了一点点蛛丝马迹，幸好它奔流不息的江河滋润养育了周恺这个当代说书人。在铁牛门前，“卧听江水拍岸，眼见人间无常”，搜索去日记忆，把档案馆里的故纸和人们口头的旧故事变成鲜活的文学新语言。在《天南》停刊后，我们仍保持紧密的联络，经常你来我往，成了“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朋友，他与我分享了许多他的文学经验和阅读资源，令我受益匪浅。《苔》是他第一部完整出版的长篇小说，只代表了他尝试的多种风格的其中一种，他的文学世界仍在不断构建之中，有待进一步浮出水面。我很荣幸为此书写下这篇序言，作他文学的见证。

2018年4月23日，芝罘

楔子

1

李氏望族的辉煌是从李稽典的“万担宏愿”开始的。自乾隆末年起，李稽典四子先后考取功名，长子入罗思举戎幕，次子任秦州知府，三子入户部，四子为黎平同知。他借此结交官府，开办丝号吉人亨，许下“富甲一郡，良田万担”之愿。嘉庆年间，位于草堂寺的李氏宅邸仅厨房就有九间，另有大小天井四十八个、花厅八间、上下房九十间，还不算他为四个儿子建的小院落。此后，乱匪举事渐多，道光九年，逢李稽典古稀之寿，他捐出二千三百两银子整修城墙，雇丁勇百名，护卫宅邸，一场场血雨腥风后，私产并无太大损失。道光十二年，李稽典寿终，只留下一句：“有田土九千七百担。”四子李怀易回来奔丧，听罢此言，立即在白庙乡购田三百担，并留下家眷家丁百余人。

在李稽典四个儿子的经营下，吉人亨产业渐渐扩大，凭着雄厚的底子，以低廉的丝价挤垮其他生丝户，一家独大后，再哄抬丝价，促使制绸成本增加，伺机并购绸庄。李氏在白庙、苏稽、水口等地的田土专事种桑养蚕，每年春分过后取丝，再将新丝运

到城头隶属李氏的四家织局；熟练的织工两两合作，一天出半匹坯绸，最后送到练染坊。成品绸缎或生丝分别经水路、驿路销往成都省，返回时，吉人亨的车队和商船还会捎回些杂货，自用或者出售。

正春风得意时，不想顺天军在川滇起义。咸丰十年，李稽典出资修筑的城墙没有阻挡住李短鞞和蓝大顺，义军打进嘉定府，烧掉了李氏宅邸，空巢烧了两天两夜。待李稽典的子孙归来时，家业已被焚毁。再及同治五年，十名苦力捣毁嘉定府东、西、北门三个厘局，局绅失踪，举城商贾罢市，吉人亨旗下商行先后关门倒闭，只余本业绸庄丝号还苦苦维系着，嫡系孙辈纷纷外出谋官。

当初李怀易在白庙乡购买的三百担田落到了庶出的李普福手头。李普福是同治十二年的拔贡生，朝考后任澧州州判，光绪九年开缺回籍，从嫡兄弟手头打来田土，单另办起了福记丝号。彼时，宜昌已开埠，嘉定城渐兴洋纱洋布，本地土绸土缎没的销路，好在李普福在衙门任职时，认识不少两湖绸商，见本地绸庄办不起走，他便做起下江生意，与本地匹头铺合摊运费。船只下水载福记的生丝，上水载回匹头铺的纱布，不仅腾空了囤货，还与洋务官商搭上了线，每有新风头，他总是最先得知。

李普福回乡次年便着手迁宅，他们起先住白庙场场口的一栋旧宅，桑田与茧坊却在铜河畔的刘河坝，相距十几里地。雇用的桑农常趁监工不在，偷拿生丝，李普福便决定到刘河坝划一片宅地，搬过去。动土当天恰见一颗两丈长的扫把星，当季又遇大旱，场上的大户尽都劝阻他，可他并没有延缓迁宅进度，只是在完工后请了个风水先生调整布局。新宅原有正房五间，左右耳房各三间，东西厢房各五间，下厅房十余间，下书房两间，带前出廊；

调整后，一排右耳房或拆成菜园，或改作杂屋，大门歪斜，这样的格局招来了闲话，道李普福营的是歪门邪道。这话是乡绅传出去的，这么说，全因李普福派头盖过了他们，李普福归田时，裹走了州衙的一套行头，出门包锣开道，或坐竹编滑竿，或坐四抬官轿。关于李普福的闲言还很多，另一句更为歹毒，说李普福没的子嗣，万贯家财也无人继承。这话则是王棒客传出去的，他这么讲，并非刻意诋毁李普福，而是有别门心思。某日酒间，一桌子棒佬儿摆说李普福究竟存了好多银子在银庄头，尽都仿若亲眼见着，福记下人如何使六七乘板车，拉起银箱子朝钱庄去。到末了，王棒客幽幽道一句：“哪个都莫打我姑爷的主意。”听者一愣，再大笑，打诨问：“佳期定没有？”唯王棒客一副正儿八经的模样，说：“麻料都送过了。”

入宅当日，李普福在刘河坝摆了八十桌大席，堂口大爷、达官显贵、平头百姓皆为座上宾，除实亲外，一律谢绝礼金。待菜上齐，李普福携六房妻妾，头杯酒敬桑农，道：“圣贤书读了四十载，通通不作数，今后只认你们做先生。”第二杯敬绸商，道：“千年未有之变局，你们打的是头阵，我不过送些粮草。”第三杯才敬乡绅，道：“承蒙关照。”三杯饮尽，水烟司清了清嗓，代为宣布福记将捐资在汉河口开凿渡口，满堂起身齐贺。那王棒客等客伙散得差不多，才走到李普福侧边，先道了一番客套话，见李普福仍挂着笑脸，斗胆往下说：“我屋头有个黄花女子，媒婆受托来说过五六回，都被我打发走了。”李普福问：“先两天的拜帖是你送的？”王棒客点头。李普福凑到他耳边说：“正将缺炷香火。”王棒客忙道：“听闻了，听闻了，福爷挑个日子，我引她来，打个照面？”李普福光笑，不再搭他的白。

这王棒客是何人？

白庙场上有四大姓：宋、吕、杜、鲁。以埝沟为界，有“宋半场，吕半截，杜鲁两姓一个角”之说，场上有三座戏台子，新戏台归宋家，文武宫戏台归吕家，旧戏台归杜家。吕氏族长吕济平行二，屠宰出身，清水皮礼字旗，因堂口二爷是留给关圣人的，故改喊平三爷。那王棒客正是吃他的浑水饭，替他杀过人，放过火，顶过罪，平三爷待他亦不薄，在胆巴桥送了他一套院子。

隔了一月，逢张爷会，平三爷请戏，胆巴桥一头是王棒客的院落，另一头就是文武宫戏台。戏台下是一片敞地，白天是烟市，烟贩收摊后，戏班就开始布置，台子上扯了门帘耳帐，台子下摆了六排桌椅，桌上有茶水和糖果。李普福到场时，六排桌椅都坐齐了，平三爷招呼他到前头，让了个头排的位子出来，族长、保长都起身作揖。李普福与平三爷共一张几，刚落座，平三爷便招手喊来一旁的王棒客：“开戏嘛。”又顺口问了句：“找到没有？”王棒客向李普福哈了下腰：“还在找。”李普福侧身问平三爷：“找啥子？”平三爷说：“他女子不见了，担怕是走落了。”王棒客去传了话，当家人便招呼戏子到后台点醒几句，锣师在侧边先一通打闹，鼓师领腔，净角先在上马门候场，帐内挑燃三星灯，捡场的吼了声：“哎哟喂。”净角颠转身就朝外头跑，众人大笑，灯光渐渐铺满帐子，这才看清帐子后悬了个人。平三爷跨上台，牵开帐子，这具挂着的女尸正是王棒客的千金。

2

刘河坝是铜河故道，主航道西移，另有一条汉河东流，亮出中心坝，上游有明代修建的泊滩埝，埝渠将中心坝切成五块，刘

河坝居中，因刘姓人家聚居而得名。河水由西南方流来，地势陡降，水流湍急，上游罗汉、嘉农一带的货物走水路居多，刘姓青壮汉子在铜河及汭河以拉纤为生，妇人老者则务农。李普福在此办丝业后，招了一批人做长工，另有一些人只在孵蚕时帮短工，别的时候仍干拉纤的活路，随着生意有了起色，整个中心坝都改种柞树、桑树。

福记蚕房在刘河坝西头，足有四五户农房大，蚕房分贮茧、贮桑、交尾、孵卵、小蚕、大蚕、上簇各域。前一季养蚕结束后，雇农肉眼挑出种茧，将雌雄种茧串挂起来。七八天后出蛾，自行交尾后，提出雌蛾，放在白布上产卵，再将白布存放起来，将母蛾焚烧深埋。次年惊蛰春分前后抱蚕蛋，在蚕卵上铺一层棉花，待蚕卵变黑，置于户外晾晒，再送回蚕房，陆续孵化，分大小蚕饲养，小蚕房有细火环绕。最闹热的就是这个时候，雇农分头采桑、切桑、喂桑和除沙，遍地都是咀嚼声；蚕熟后，由老桑农负责上簇采茧，将熟蚕装入草笼，分拣出死蚕；结茧后，再拣出烂茧和种茧，余下的便送入茧坊缂丝；出丝后再晾晒，最后打捆装船。

在李普福开凿渡口前，刘河坝只有泊小木船的散桩，生丝需要桑农使箩兜挑到上游的大埧装南河船，那大埧属白庙哥佬会礼字堂的码头。先开始，再随李普福如何威风，那码头狗腿子都不买账，送一趟，就要打点一趟。自戏台挂尸之事后，狗腿子些再不开腔再不着声了。

戏台上的尸体是先被人勒死再挂上去的，黑衣人藏在戏台背靠的茶坊阁楼上，耳帐帘子一拉，底下看客便看不见台上的景象。趁锣鼓师敲打，黑衣人带着尸体跃到台上，用备好的绳索将尸体悬挂起来，戏子被当家人叫去，他正好从下马门撤走。

帐子一牵开，王棒客便晓得是哪个干的，他虎凶凶跑回院子，拿了把土铳要出去毙人，平三爷一面稳场，一面派人去拦王棒客。李普福故作惊恐，先告了辞。官府当场没有捉到人，也没有找到证据，此事以上吊告了。平三爷虽劝住了王棒客，他仍不服气，放话说，此仇必报，这番话传到堂口弟兄耳中，反倒震慑住了他们。都约莫猜到，这事情多少跟李普福有干系，可没的人能猜到，那黑衣人正是李普福的新管事。

早在李普福回乡前，便让三房先行返乡盘算纳妾的事。一要相貌品行端正，二要屋头历来有生儿的传统，挑来选去，要么不入李普福的眼，要么不入长房的眼。后头，这事情又因迁宅耽搁了。

巧的是，大旱之后，刘河坝一户桑农出了一对双胞胎，两个都是男婴，户主刘基业到县城讨赈灾粮，与众灾民闹衙门，打死了一名衙役，逃到外乡去了。李普福差人找到他，在正厅接待。吃饭时，李普福问他一年收入好多，婆娘有无恶疾，又说，逃得脱一时，逃不脱一世。刘基业当众把筷子一甩，说：“李老爷，好酒好菜吃饱了，感谢咯。我刘三儿若干的是邋遢事，不消你劝，我自晓得投官，你也莫要打我婆娘的主意，你行势归行势，老子横顺一条命。”引得旁桌的女人伙些大笑不止，李普福也一面笑，一面扶正瓜皮帽。

李普福的幺房先开口：“刘三哥，不是我骗嘴，老爷要纳妾，门口早都排长龙了。”又说：“老爷问你的意思是，你刚抱了一双儿，吃穿都要钱，你留下个女人守屋算啥子，跑不是办法。”

刘基业消了气，向李普福赔了不是。

李普福问：“你干过啥子活路？”